

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

□ 蔡昉

【核心看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我们仍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助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老年人力资源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如果老年人口中一部分成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会相应提高,将会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其他国家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政策上应做相应调整,特别要着眼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实际退休年龄,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最终消费需求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老年人是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应该进一步挖掘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使之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突破口在于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既要做好做实积极就业政策,还要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既要进一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还要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根据联合国对2015年至2050年期间的最新人口预测,其间人口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年均提高幅度,世界平均为1.59%,发达国家平均为0.93%,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99%,中国为2.39%。这样,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35.1%,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远超过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16.4%的平均水平以及21.3%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有关国家生育率难以逆转的经验,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便将来因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生育率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一定幅度的变化,也不会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

从经济学角度准确理解人口红利

以前人们理解的人口红利含义过于狭窄,仅仅看到劳动力供给这一个角度。这种理解不利于正确认识人口转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导致错判人口转变的形势,低估人口红利的作用,延误政策调整的时机。既然我们讲的是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需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

根据我们进行的多次计量经济学估算,人口红利是指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增长快及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以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加快改善;低人口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劳动力充分供给有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障投资高回报率;转移剩余劳动力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相应提高,便不是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转折性变化,并且不仅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从上述列举的各种变量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后我国GDP增长率逐年下降,也印证了中央关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

以上是从供给侧看人口红利如何表现为经济增长动能。我们还可以从需求侧看一个有利的人口结构如何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在具有明显人口红利的条件下,人口结构年轻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劳动力丰富使制造业产品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并保持外部需求;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有利于保持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可见,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意味着这些需

求拉动作用的显著弱化。

从供给侧看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老龄化既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预期寿命以及健康寿命延长的结果。因此,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应该得到挖掘从而使它们对经济增长作贡献。目前,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普遍提高了退休年龄,大体上平均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设想如果把我国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涉及的劳动年龄人口扩大规模可达8000余万,增加幅度为9.1%。目前,从一个时点截面上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45岁就开始显著下降,且实际退休年龄远低于60岁,所以可供挖掘的潜力更大。如果老年人口中一部分成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会相应提高,将会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这样做在实践上的难点在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分布特征。总体上,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按年龄排列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从24岁开始,随着年龄的提高而明显降低,一旦年龄超过45岁,其受教育年限就已经低于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到60岁左右时则更接近于小学毕业水平(六年)。这些年龄大的人群具有的认知能力和技能,通常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因而容易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或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职工普遍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抱有疑惑的原因。

但是,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政策上应该做相应调整。首先,要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强职工技能培训,把培训资源向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群体倾斜,针对特殊需求提高这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其次,要结合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设计出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年龄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参与率。第三,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操作目标,应该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不是减少养老金发放;实施手段应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调整法定退休年龄。

从需求侧看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老年人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可以起到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等因素作用下,净出口作为外需将趋于疲软;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从长期看,投资需求将进入一个常规增长的周期。因此,最终消费需求将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其中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应得到进一步挖掘,使之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研究发现,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群体,其消费力趋于减弱。在发达国家,这个现象与人们随年龄增长收入和财富得到积累的情况相悖,所以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从我国人口的年龄与消费关系看,也有消费力随着年龄提高而减弱的趋势,却算不上是一个“谜”,因为消费水平变化与收入水平变化的轨迹是相一致的。从横截面数据看,我国人口的收入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曲线,即劳动收入从接近20岁才开始有,随后迅速提高并于25岁至45岁期间达到并稳定在高水平上,以后则逐渐下降,到60岁以后便消失。相应地,消费水平也在30岁至40岁之间形成峰值,随后便缓慢降低。所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突破口在于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要把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得更细更实。特别要聚焦于保障年龄偏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通过培训提高这个群体的就业技能从而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尽可能提高劳动参与率。只有通过稳定就业保持他们的收入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并使其积累起必要的财产,才能稳定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

其次,要完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筑牢退休群体消费的经济基础,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为了根本解决养老保障全覆盖的问题,应该增强养老保障的普惠性质,保证使每个人达到一定年龄后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增强养老保险的积累性质,辅之以能够保值增值的基金运营机制,如以个人账户或企业年金等多种形式作为补充养老。

第三,建议进一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尽早尽快实现自主生育;配合生育政策调整,加强有针对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解除年轻夫妇的后顾之忧;继续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提高总和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这类政策还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跨代负担,不必为补贴子女甚至孙子辈而过度储蓄。

最后,在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过程中,要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研究其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消费特点。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老年家庭与年轻家庭相比,前者在与工作相关消费和教育消费大幅度减少的同时,食品消费增加21.4%,医疗保健消费更是大幅度增加,提高幅度高达21.3%。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与老年人消费相关的产业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此外,还要防止商业模式中不利于老年人的数字化鸿沟,针对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提高其消费便利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激发经济新动能

根本在于改革开放

近日,“国研智库·新旧动能转换泉城论坛2018”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出席论坛,并围绕“深度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表示,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旋律。近期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凸显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短板,也凸显了发展新动能、加快动能转换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才能在更好应对外部挑战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伟强调,根据当前我国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各国激烈竞争的态势,充分培育激发经济新动能,根本路径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一是在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中谋创新、谋发展。现在的新工业革命成果很多是集合了全球智力的成果,是各国科技人才相互激发、相互竞争的产物。当前,我国在多个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还有许多“卡脖子”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二是在真正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中谋创新、谋发展。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相继成为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好。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创新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

三是在着力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中谋创新、谋发展。快速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变革很可能引起原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并引发不恰当的过严监管,而新技术、新事物初期力量弱小,本身就不完善,过于严格的要求可能会从一开始就扼杀了新产业的发展。历史上,英国“红旗法案”的例子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对新兴产业一定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要在“强监管”和“包容性监管”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而为新兴力量的发展创造时间和空间。

四是在营造公平竞争和简政高效的营商环境中谋创新、谋发展。近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压缩企业商标注册周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各地的营商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优化和进步。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营商环境整体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要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要从以前的“比招商、比优惠、比政策”转变到“比管理、比服务、比营商环境”上来,以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发展,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和新旧动能转换。

(杨澍)

本版编辑 欧阳洵

加快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 杨长涛

学术经纬

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这为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高开放发展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的支撑。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是我国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更好开拓国际发展新空间的必然要求。去年以来,世界经济虽然呈现回暖向好态势,但尚未走出亚健康弱增长的调整期,新的增长动力仍未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在新形势下,只有通过建设全面开放体系,加快培育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等,才能有效对

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为商品、资本、技术等引进来和走出去开拓更大市场空间。

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是我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疲弱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贸规则进入艰难重构期。这既给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带来较大挑战,同时也推动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其中一个关键着力点就是建设全面开放体系。对内,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的建设和制度创新经验推广,扩大市场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对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是扩大中高端供给,还是减少低端无效供给,都不可能离开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而孤立完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利用境外优质的资本、技术等资源,从而更好地弥补短板,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同时,还要通过主动开放加快走出去,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既要啃硬骨头,也要涉险滩,更需要发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比如,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倒逼国内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倒逼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总体看,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更好发挥开放型经济领域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顺利爬坡过坎的必然逻辑。

(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需要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四个转变。

从发展基础看,要从低要素成本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一方面,要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要巩固和拓展传统优势。继续挖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素成本潜力,加快承接沿海加工贸易转移;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通过这两方面措施,共同打造产业、区

位、营商环境等综合竞争优势。

从发展模式看,要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眼下,应切实摆脱“规模情结”和“速度情结”,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推动利用外资向引资、引技和引智相结合转变,更好地利用搭载在外商投资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等;提高对外投资营利能力,促进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发展相协调。

从激励机制看,要从优惠政策为主向制度规范为主转变。主要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为抓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形成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通过向全国复制推广相关经验,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同时,也要照顾各地开放基础的差异性,调动地方积极性,形成规范制度为主、优惠政策为辅的优良营商环境。

从治理地位看,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遵循者向参与制定者转变。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

向发展。

(三)

建设全面开放体系要求补齐结构布局短板,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从区域开放布局看,内陆沿边开放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与沿海相比仍是开放的洼地和短板。应着力解决制约内陆沿边开放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等问题,探索内陆沿边开放的有效模式和路径,补齐内陆沿边开放短板,实现沿海与内陆沿边开放相协调。

从领域开放布局看,服务业仍是对外开放的一块短板。应继续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补齐服务业开放短板,使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合作伙伴布局看,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仍需大力提升。要进一步发掘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的潜力,发挥我国商品、资本、技术、市场等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更积极主动地拓展经济合作新空间。(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